

思想库的历史沿革及发展

孙志茹^{1,2} 张志强¹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兰州 730000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通过全面搜集期刊论文、网络论文、学位论文以及专著中学者们为现代思想库所下的学术定义,并从思想库的组织形式、工作内容、服务对象、工作目标和性质等几个方面对这些定义作内容分析,从中了解学术界对思想库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思想库在这些方面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变化情况,并且展望未来思想库的发展。

关键词 学术定义 内容分析 思想库

中图分类号 C9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2011)01-0037-05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its Academic Definitions

SUN Zhiru^{1,2} ZHANG Zhiqiang²

(1. The Lanzhou Branch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 Information Center for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ademic definitions form odem think tank collected from jomal articles, Internet papers, dissertations and monograph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ontent of these definitions according to organization form, job content, clients, objectives and nature of work, then further analyzed the developm ent of think tank over time and prospecte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academic definitions, content analysis, think tank

0 引言

思想库 (Think Tank) 一词产生于二战时期的美国,当时是个纯军事术语,用以指称军事专家和非军事专家一起制定进攻计划和其他军事策略时所处的安全环境。战后,这个词就被用来指为军事做深入分析和方案评鉴的合同研究者,如兰德公司。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思想库的含义已经扩展到提供各种政策建议的其他专家组,包括一些进行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研究的准学术性研究机构。而发展到 20 世纪 70 年代,思想库所指的机构不仅关注外交政策和防御策略,还从事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研究^[1]。此时,现代意义的思想库概念已经形成,思想库作为政治领域的一个特殊现象也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思想库”这一政治现象已经遍及全世界各种

不同的社会中 (如中国、日本、马来西亚、阿根廷、英国、美国等等),其本身的形式、范围等方面不断产生着变化,学者们对思想库概念的理解也几经变迁。本文将着重分析不同时代学术领域的思想库定义,以此来分析思想库的发展变化情况。

1 研究方法

为了全面搜集具有权威性的思想库学术定义,本文在 Web of Science、Springer 和 ProQuest 数据库中分别搜索标题中含有“think tank”和“think tanks”的文献,并进一步通过手工筛选,去除非英文文献和主题无关文献 (如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和医学领域中“思想库”)。并且从中抽取作者通过分析研究后给出的思想库定义,以及作者在文中引用的其他文献中的思想库定义。另外以通过 Internet 搜索获取的思想库学术

定义作为补充。受到文献可获得性的限制,通过以上几项工作本文共获得时间跨度为 1989~2009 年的思想库定义 18 条(时间分布情况见表 1)。其中,有 10 条来自期刊论文,6 条来自专著,还有来自学位论文和网络论文的定义各 1 条。获取这些定义后,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思想库的组织形式、社会职能、工作内容、服务对象、工作目标、性质等方面对思想库的定义进行分析,从中获得思想库发展变化的信息。

表 1 思想库定义时间分布表

年份	1989	1992	1993	1996	2000	2002
定义数	1 条	1 条	1 条	2 条	3 条	1 条
年份	2003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定义数	1 条	2 条	1 条	3 条	1 条	1 条

2 定义分析

2.1 思想库的组织形式——政策研究机构 思想库在组织形式上经历了逐步走向稳定的过程。目前大多数学者在思想库的组织形式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只有在较早时 Weaver 认为思想库是一个研究产业 (research industry)^[2]。而在之后的研究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唯一分歧只在于是否将专家团体包括在思想库的范围之内。Bernardo M. Villegas 在 1996 年将思想库直接定义为专家团体 (groups of professionals)^[3],而 John Fenwick 在 2006 年给出的思想库定义则将专家团体和研究机构都包括在思想库的范围之内^[4]。除此之外,其他研究者都将思想库定义为一类“研究机构”(Institute Institution 和 Organization)。思想库组织形式定义数量分布见图 1。事实上,稳定的研究机构形式更有利于思想库服务公共决策。另一方面,对于思想库用户(特别是政策决策者)来说,组织形式的稳定不仅能促进与政策议题相关的研究的持续,能够有源源不断的政策建议产出,而且也有利于建立政界与学术界的稳定联系,促进政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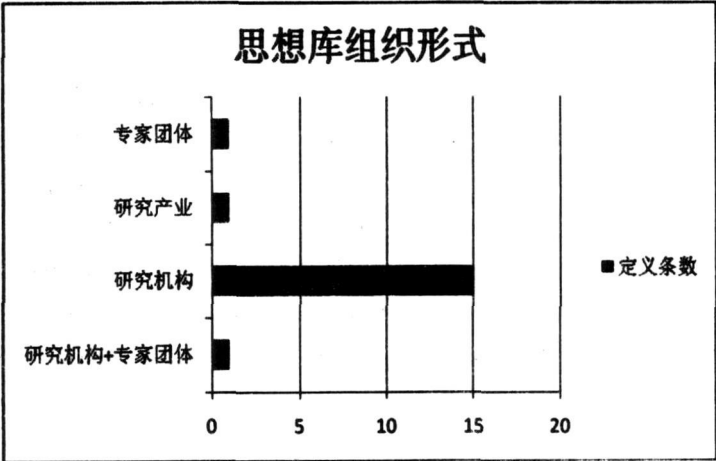


图 1 思想库组织形式定义数量分布图

2.2 思想库的工作内容——政策研究 这些思想

库定义中所定义的思想库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公共政策研究、多学科研究、产出知识和思想以及研究成果的宣传与交流(见图 2)。在所有 18 条定义中有 14 条都明确地将“政策研究”定义为思想库的工作内容,而谈及其他三项内容的定义则零星见于少量几个定义中。如 Simon James^[5]和 Bernardo M. Villegas^[3]将思想库的工作内容定义为“多学科研究”。Richard N. Haass^[6]、Strobe Talbot^[7]、Andrew Rich^[8]和 Philip Schlesinger^[9]将产出与政策相关的知识和思想也列为思想库的工作内容。而 Bernardo M. Villegas^[3]、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0]及 Strobe Talbot^[7]将研究成果的交流与推广也纳入思想库的工作内容范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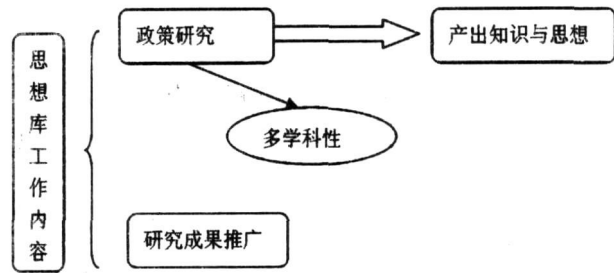


图 2 思想库工作内容关系图

通过仔细分析这些定义中所谈及的这几项工作内容不难发现,思想库一直以来都将公共政策研究作为其工作的重心。而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确切地说应是政策研究的一个特性,公共政策研究一般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跨学科性或多学科性。产出知识和政策思想应该被视为政策研究的结果。而思想库在研究内容方面的一个最大变化在于其越来越重视研究成果的宣传与推广。思想库产生之初多是受政府部门的委托就某些特定的问题展开研究,其工作内容也是围绕政策分析与研究而进行。而随着政策决策日趋复杂,社会上不仅思想库的数量与日俱增,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机构如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游说集团、政府研究部门等也都成为政府政策建议的主要来源。思想库为了能在拥挤的思想市场上竞争和影响政策决策的建议,在过去的 30 几年中,这些机构的宣传投入越来越多,甚至和研究投入持平^[6],也出现一些思想库过于重视这种“倡导性”工作,甚至对这方面的投入比研究投入还要多,学者们常将这类思想库称为“倡导型”思想库。但是作为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产出严谨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是思想库的立足之本,这也是用户对思想库的基本要求。只进行研究而没有推广就会使思想库变成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而宣传投入比例过多就会使思想库与游说集团无异,因此应适当

调整工作比例才能够保证思想库的长久发展。

2 3 思想库的服务对象——政策决策者和公众

在这组思想库定义中, 只有 2007 年的 2 条明确谈及了思想库的服务对象这一问题。Strobe Talbot 认为思想库要让政策制定者、舆论领袖 (opinion leader) 和公民获得它们的政策建议。而 James M c gann 就更加明确地提出思想库所进行的研究与分析是服务政策制定者和公众, 帮助他们进行决策^[7]。

思想库最早只是服务政府部门, 使用其研究人员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研究分析能力来弥补政府官员在专业信息上的不足。而随着社会民主的发展, 公民的权益在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广大公众虽不是政策的直接决策者, 但却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政党活动、听证会、上访信访、主动接触各类官员、参加民意调查、控告、上诉、申请复议、借助媒体等多种方式参与政策决策。当代思想库的研究焦点也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官员的需要, 而更多地是将其目光扩散到广大的公众身上, 从公众利益出发来寻找研究课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这样的调整促使思想库的研究与政策环境更紧密地结合, 更接近政策实践。

2 4 思想库的工作目标——影响公共政策

纵观诸多学者对思想库工作目标的定义可以看出, 思想库的工作目标是一个逐渐明确、逐步具体的过程。早在 1993 年 Simon Jan es 就将思想库的工作目标定义为“影响公共政策”^[5], 在这之后的 1996 年 Bemardo 将思想库的影响范围的定义扩大到广大公众 (public at large) 和其他目标受众 (targeted audiences)^[5]。10 年后朱旭峰在定义中国的思想库时将其目标定义为“影响政策过程”^[11], 这要比之前的定义更为具体。而 Jan es M c gann 在同年发表的专著^[7]中将其目标定义为使政策决策者和公众做出明智的决策 (inform ed de cisions)。其寓意要比影响政策过程更进一步——强调了对政策过程产生正面影响, 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思想库工作目标发展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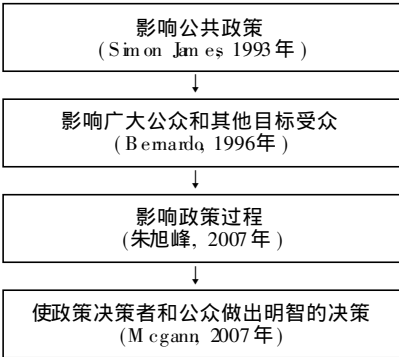


图 3 思想库工作目标发展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思想库对政策决策的重要作

用已经受到全世界的认可。思想库不是具体的行政部门, 对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没有实在的权利, 而只能通过影响与政策决策相关的人员来影响最终的政策。思想库首先对这些人员范围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只认为影响政府官员即可达到其影响政策的目标, 而到后来逐步认识到除了决策者, 还有各领域专家学者、利益集团、科研机构、商业机构以及广大公众等都具有影响政策决策的能力, 所以思想库开始重视通过影响公众和其他目标受众来间接地影响政策决策。除了认识到要扩大受众的范围, 思想库的工作目标也更为具体化, 那就是要以其客观、公正、高质量的分析与研究来提高政策决策的质量, 希望通过影响决策者和公众来促进“明智决策”的产出。

2 5 思想库的独立性

有关思想库的独立性散见于不同时间段的思想库定义中 (见表 2), 独立性是对思想库的一贯要求。在这 18 条定义中, 有 8 条定义都将独立性作为思想库的主要特性之一。思想库为了避免成为游说集团, 就必须证实它的独立性。而思想库对于这一特性的阐释, 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表 2 思想库独立性定义时间表

年份	1989	1992	1993	1996	2000	2002
独立性			✓	✓	✓	✓
年份	2003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独立性		✓		✓	✓	

首先, 形式独立已经不再是对思想库的重要要求。在较早的定义中, 学者们认为思想库应独立于政府、政党或利益集团^[1 12], 但是可以是附属于学术机构的研究机构^[3]。而在最近几年的定义可以看出, 学者们认为思想库可以是附属的研究机构^[13], 也可以存在于政府内部、高等教育部门或私人部门^[4]。可见, 学者们已渐渐不强调思想库在组织形式上的独立, 尤其是许多大学附属的政策研究机构都被视为思想库, 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14]就被认为是提供国际问题创新研究的思想库。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思想库都是大学附属思想库^[13]。

其次, 思想库的独立性还表现为财政独立。如果思想库的财政方面能够独立, 就能够按照其自身的条件来选择和接受研究项目。但是,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许多西方的思想库就都不能称为思想库, 因为它们的研究依赖于、并且常常是主要依赖于政府资金^[11]。而随着思想库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繁荣, 是否有政府提供研究资金也不再是一个研究机构是否成为思想库的标识。例如, 中国的思想库大多是属于“官方思想库”, 主要由政府提供资助。所以说, 当代的思想库既可以是私人资助, 也可以是政府资助^[15]。

最后,观点的独立是一个机构成为思想库的必要条件。虽然其他涉及思想库独立性的定义都没有明确这一概念,而只是简单概括思想库是“独立的”研究机构。而实际上对于思想库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政策观点上的独立,观点上的独立要求思想库的研究不受政府、政党、企业、利益集团的社会利益的影响,确保其产出政策建议和观点的客观性。思想库研究成果的客观性一般很难掌握和控制,从形式上进行限制则更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一些政府部门、政党和企业下属的研究机构被排除在思想库范围之外。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观点的独立才是一些政策研究就之所以成为思想库的关键。

2.6 非营利性 思想库的非营利性曾经被认为是思想库的重要特征。在 2000 年之前的(包括 2000 年)的定义中很多都把非盈利性包括在内^[2, 12, 16-18],而在这之后,只有 Andrew Rich^[8]提及了非营利性,其他的学者则并不对此进行限制。究其原因是近些年思想库在全世界普遍发展的缘故。

思想库产生于美国,美国的思想库在商务注册时注册为非营利组织,是按照美国 501(c)3 条款的规定来执行。根据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它应该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主要从事社会公益性服务,它的盈利所得完全用于发展自身事业,而不能图利他用,政府免征非营利机构的所有税种^[19]。也就是说,过去强调思想库的非营利性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而随着思想库在其他国家出现,受当地政策和法律环境的影响,很多思想库并没有被注册为非盈利组织。例如在中国,有一些政策研究机构虽然注册的是营利性的企业,只是因为成立其他类型的法人的手续比较繁琐。如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注册的就是股份合作企业,他依靠合同研究以及各地演讲的收入来维持机构运转。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之初也是企业性质。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思想库而言,由于法律不健全,捐助的法律机制不强,很多民间研究机构均存在经费短缺问题。在中国存在这种典型的所谓“挂两块牌子”的组织,就是指同一单位分别注册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两种组织形式,从而通过部分盈利业务的收入补贴非营利的业务^[19]。然而,现在的思想库虽然没有在形式上限制这类机构是否是非盈利组织,但是在本质上思想库应确保其政策研究这部分工作的非盈利性,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其观点的客观和独立。

2.7 思想库的多学科性 多学科性也常被认为是思想库的一个重要特性。它是思想库内外对其研究工作的一项具体要求。这一要求最初比较严苛,Simon James 在文献中特别强调了其所从事研究的多学科性。他认为思想库的多学科性特别重要。思想库工作

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间,其员工有着广泛的兴趣和专业知识,这些都使得思想库对政策问题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使得思想库的视野更广阔,也使它们将政策观点置于更为广泛的环境中^[5]。例如,比起一般的学术研究,由一个国家卫生部门的政策研究机构所做的研究就可能在比较广阔的一般社会政策和公共财政的框架下来讨论,而缺乏这种较为宽广的视野通常是学术研究的缺点。而按照 Simon James 的观点,一些专门从事某一政策领域研究的机构就要被排除在思想库的范围之外。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它们都是规模很大的专门从事外交和国防事物的研究机构。

然而,公共政策的复杂性逐渐增加,社会对不同政策领域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大,专门针对某一政策领域进行研究的专业思想库就随之发展壮大起来。此时,各方面也就不再严格要求思想的多学科性。如 Bernardo M. Villegas^[3]和 Thunert M.^[15]的思想库定义中虽然也涉及了多学科问题,但却没有 Simon James 定义得那么局限。Bernardo M. Villegas 认为思想库所做的研究可以是某个单一的政策领域,也可以是涉及所有可能的政策领域。Thunert M. 在谈及思想库的这一特性时使用了“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y)”这个词,认为思想库的研究常常是跨学科的。他还提出,一个研究和咨询机构能称得上是政治意义上的思想库就需要它为政治问题的公共主位化(publication)做出贡献,并且为政治决策的制定准备证据,而不管是哪个政治领域。虽然思想库研究的专业化逐步增强,但就其具体的研究工作来说,不仅涉及专业领域的知识,还需要联系现实政策情境。所以说,即使是研究某一议题的专业思想库也已经超出了单一学科的工作内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单纯地追求专业化只会将思想库归为纯粹的学术机构。所以,思想库既要向着专业化研究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以多领域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提供政策研究和分析。

3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思想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这种变化不仅来自思想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源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期望的转变。从过去几十年思想库的发展来看,未来的思想库将更加重视提供高质量和客观的政策研究和分析,并不断提高其营销研究成果和政策思想的技巧和能力,在社会上广泛进行交流,成为思想独立、形式稳定、不以盈利为目的、切实服务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研究

机构。

参 考 文 献

[1] Weaver R K, G M cGann J.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 [M]. London: Transaction Pub, 2000: 2

[2] Weaver R K.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J].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1989, 22(3): 563- 578

[3] Villegas B M. A Think Tank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J]. Economic Reform Today, 1996(3): 18- 21

[4] Fenwick J. Thinking About Think Tanks [J]. Parliamentary Affairs, 2006, 59(2): 380- 384

[5] James S. The Idea Brokers: The Impact of Think Tanks on British Government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3, 71(4): 491- 506

[6] Haass R N.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 [J]. US Foreign Policy Agenda, 2002, 7(3): 5- 8

[7] McGann J G. Think Tanks and Policy Ad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cademics, Advisors and Advocates [M]. Oxford: Routledge, 2007

[8] Rich A.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9] Schlesinger P. Creativity and the Experts: New Labour,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 & Politics, 2009, 14(1): 3- 20

[10] Program U N D.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from Thought to

Policy [M]. Bratislava: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3

[11] Zhu X F, Xue L. Think Tanks in Transitional China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27(5): 452- 464

[12] Stone D. Capturing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Think Tank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M]. London: Frank Cass, 1996: 16

[13] McGann J G.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 [EB/OL]. 2007. [2010- 9- 5]. [http://www. fpri. org/ research/ think- tanks/mcgann_ globalgo_to_think_tanks. pdf](http://www.fpri.org/research/think-tanks/mcgann_globalgo_to_think_tanks.pdf)

[14]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OL]. [2010- 4- 7]. [http://fsi. stanford. edu/](http://fsi.stanford.edu/) 2010

[15] Thunert M. Think tanks in Germany [J]. Society, 2004, 41(4): 66- 69

[16] Abelson D E. Descending the Ivory Tower: 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76- - 1988. [D]. Kingston: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1992: 7

[17] Rich A, Weaver R K. Think Tanks in the U. S. Media [J].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0, 5(4): 81- 103

[18] May v B. Think Tanks to ASEAN- EU Relations: European Perspective [EB/OL]. 2000. [2010- 3- 23]. [http://www. dgap. org/ publikationen/ view/ 11739a72eb0911da96bf6ba28e3f88078807. htm l](http://www.dgap.org/publikationen/view/11739a72eb0911da96bf6ba28e3f88078807.html)

[19] 朱旭峰. 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64

(责编: 白燕琼)

(上接第 36 页)

础, 在域相近的图书馆之间已有过文献合作共享的尝试,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毗邻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两校藏书在文科与工科上正好是优势互补, 所以部分文献借阅实现了通借通还的共享机制。而江苏省高等学校文献信息保障系统、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协作网、北京高校图书馆联合体等地区性组织, 为进一步开展合作存储文献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 在思想上容易达成合作的共识。不仅相近区域的图书馆可以开展分布式合作储存, 远程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收藏相近文献主题的机构哪怕相隔千里也可以展开合作, 共享资源。例如,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以西夏学文献为特色文献, 而国内的西夏学文献收藏还分布在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西安市文物局、宁夏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等机构, 如果这些机构间达成文献共享的共识, 采取分布式合作储存, 共建分布式文献网络, 在不损失文献的情况下可以形成系统完整的西夏学文献, 对于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良有裨益。各层次的图书馆、藏书机构根据自身馆藏特色

与地域关系建立分布式合作储存联盟, 优势互补, 最终形成区域性的各层次特色文献资源共享的网络体系, 从而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 符合不受时空限制的未来国际文献资源发展趋势, 与国家文献资源建设的总体目标一致。

参 考 文 献

[1] 朱曦. 特色文献资源的文化学意义和符号学价值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1): 73- 75

[2] 文榕生. 论特色文献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 图书馆界 [J], 2005(4): 21- 25

[3] DiBaise, Linda T, Watson Mark R. Orbis Cascade Alliance Distributed Print Repository: Organizing Collections at the Consortial Level [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09(1): 19- 30

[4] 李利方. 网络环境下低利用率文献资源的合作储存模式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J], 2008(10): 70- 73

[4] 郑春汛. 我国建立合作存储图书馆的现实意义. 图书馆杂志 [J], 2009(6): 27- 29

(责编: 贺晓利)